

一堂“十年不重复”的文学理论课是什么样子？靠着一块黑板、一根粉笔，这位老师的课为什么能收获超 3000 万的播放量？

当理论不再枯燥，找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的锚点；当上课不再是“机械性的重复”，每年都有新花样，一门看似普通的文学理论课，不仅成为洞见自我与社会的窗口，也回应了人文教育的初衷——成为一个有独立判断的“人”。

点开豆瓣话题“你在网络上最喜欢的老师”，戴锦华、戴建业、王德峰……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里，藏着一个低调的身影——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宁。

打开哔哩哔哩（以下简称 B 站），他的《文学理论》《美学原理》等课程好评如潮：“梦开始的地方”“中文系前来报到”“医学生路过”……密密麻麻的弹幕飘满屏幕。如今，其课程全网播放量已突破 3000 万。他出版的《看不见的文学——文学如何“理论”》一书，豆瓣评分高达 8.8。

一块黑板、一根粉笔，靠着满满当当的板书，以及接地气的例子，杨宁把看似晦涩的理论讲得鲜活、生动。

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汪民安评价：“这是一种禀赋——只要想想我们的文学理论课堂上有那么多昏昏欲睡的学生就能明白。”

然而，课堂外的杨宁话不多，甚至自嘲本人很“无聊”，只围着备课和上课打转。他有个“小目标”：连讲十年《文学理论》，且不重复。

## “导游”

走红后，杨宁的课堂还是老样子。北京初雪过后，一个普通的周二清晨，中央民族大学丰台北校区的积雪未消。天刚蒙蒙亮，杨宁就赶到教室，写下“意志论与生命美学”几个大字，安静等待学生到来。

这堂课便是杨宁教授的《美学原理》。“如果你的每一天都将重新来过，你会怎样对待人生？”刷刷几笔，杨宁写好板书，回过头，看着学生们困惑的目光，他换了个问题。

“中学的时候，肯定绝大多数老师都说过，‘考上大学就轻松了’，但如果当时老师说的是，‘这还会经历无数遍’，也就是困难、痛苦都将有无数次重现，你会怎么对待高考？”

所有人都抬起头，安静地思考。

“这就是尼采的‘永恒轮回’思想，每一分一秒都值得被创造性地对待，而不是浑浑噩噩地度过。”杨宁语调平缓，“你们都可以想想，现在做的事情是真正想做的吗？”

沉默依旧在蔓延。这样的气氛，杨宁已经很熟悉了，一堂理论课往往是教师的“独角戏”。

但沉默的背后，杨宁听得出来，学生们正在跟着他思考。除了他浑厚的嗓音，课堂还上演着独特的“双重复”：粉笔和黑板、笔和纸张，摩擦声此起彼伏。

写板书，这是杨宁从 2017 年站上讲台时就坚持的习惯。2019 年，他曾公开表态：“我是一个反 PPT 主义者。”2025 年 9 月，新学期伊始，他又在微博上重申：“这个学期，我还是选择用基本的方式来教学：一块黑板，一根粉笔。”

一个半小时的课上，他写了满满当当 7 块黑板。“如果只用 PPT 上课，学生们是不是觉得拍下来、存到手机里，就不用再管了，等考试前再翻出来看看就行？”他不要这样的课堂，而是选择通过板书直观呈现知识的结构和脉络，让学生的思路跟着粉笔字慢慢延展。

不过，要讲好一堂理论课，除了思考不能“掉队”，把内容讲清、讲透更加关键。

“理论根本就不抽象，都是来源于理论家对现实生活的思考。”在杨宁看来，为什么多数人认为理论课过于晦涩，“就是因为讲课时把理论背后的动因都忽略了”。

事实上，每一代人面临的现实困境总有共通之处。《爱情公寓》《金陵十三钗》、孟京辉的话剧……他用无数生动的例子作为理论与现实的锚点。

“一定要关注理论背后的问题意识。”这是杨宁一以贯之的理念，他将全部理论内容铺陈开来，不带个人喜好，也没有价值倾向，“最重要的是将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”。

更多人走进了他的课堂。学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的，甚至学会计、物理、医学的……听得懂、有意思、融会贯通，成了大家共同的评价。“这是我的‘精神食粮’。”医学专业大三学生任江（化名）告诉记者，“上了这门课，以后看书、看电影都会尝试追问其背后的价值理念，又多了一份乐趣。”甚至还有教师在社交媒体留言：“能够深入浅出把理论讲明白，对我的教学方式方法触动很大。”

但杨宁本人并没有什么架子：“我

# 决定上一门『十年不重复』的理论课 一个『反PPT主义者』

■本报记者赵宇彤



就像一个‘导游’，引导大家了解不同的理论、知识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再深入探索。”

## 上课是最重要的

2019 年，杨宁平静的生活被意外打破。

当时，毕业两年、尚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任教的他，机缘巧合下，将录制的《文学理论》视频传到 B 站上。最初，杨宁完全没想到有人会看。看着视频下方的留言越来越多，百条、千条、万条……完全超出了杨宁的预期。6 年过去，B 站上他的全部课程视频累计播放量已突破 3000 万。

粉丝、流量、节日邀约……这些“三尺讲台”之外的东西纷至沓来。而谈起走红的烦恼，他想了想，还是绕不开教学——“一旦将课程放到网上，如果讲的内容一样，又该怎样留住学生？”

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杨宁的课堂，但少有人发现，他的课程每年都有新变化。

“2024 年是从文学理论的起源和历史讲起，2025 年换了一套讲课逻辑。”打开平板电脑，杨宁将不同学期的教案分门别类、整理归档，每一堂课的脉络都用思维导图清晰标注，“文学理

论、美学原理这些课程，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，不可能用十几节课讲清楚”。

杨宁有个“小目标”：连讲十年《文学理论》且不重复，呈现各个流派和分支的全貌。

“我不想把上课变成重复性、机械性的行为，因为对教师来说，课堂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。”尽管每年都要重新梳理教案，但他不嫌麻烦，“其实，讲课也在拓宽我对于相关领域和知识的理解，这对教师的成长大有裨益”。

在杨宁回忆里，这种经历不少。

2024 年，他上传了一条关于文学评论中滥用“陌生化”理论的视频。陌生化，即通过语言变形、视角转换等方式，创造独特的审美体验。“最开始讲课时我没有太关注这个问题，但后来发现，学生们一旦了解这个概念，就开始套用它阐释各种文学作品。”杨宁笑了笑，这其实就没有“吃透”理论。

受到这一现象启发，他查阅资料，写了篇关于“陌生化”的论文，对这一文学理论的经典概念进行再考察。

“当你将上课变成一个创造性的过程，而不是机械重复的行为时，往往也能生发出科研上的灵感。”杨宁推了推眼镜，在他看来，课堂能够为科研带来源源不断的思考与活力。

因此，他每年都会结合学生的反馈，以及教学思考，对课程的逻辑和内容进行调整。“比如我 2025 年的课程和 2024 年相比，大概只有 40% 的重复内容。”

这源于杨宁的切身体会。

“我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一旦觉得台上讲的内容没有新意和启发，都是‘老一套’时，自然就分散了注意力。”上学时，杨宁就常常穿梭在各大高校的文学课堂。他发现，只有讲出新东西、新思



杨宁在课堂上。

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考、新启发，才能真正打动学生。

“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，一定要有创造力。”杨宁说。

## 学生太“乖”了

下课铃响起，等着学生们不慌不忙离开教室，杨宁快步走到教室最后，收起相机。时至今日，尽管已不再有上传视频的硬性要求，但他依旧坚持记录每节课的教学。

“每年重新备课时我都会拿出来，看看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。”这是杨宁的初衷，但他最先发现的是学生的变化，“现在的学生都太‘乖’了”。

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到中央民族大学，站在不同讲台上的杨宁，发现了共性问题：学生们总是昂着头、睁大眼睛，跟随他的粉笔字，在笔记本上写着整齐的课堂笔记。

“现在学生们上课很认真、写作业很认真，但是缺乏创造力。”杨宁的神色逐渐凝重，“他们不敢反驳教材，也不敢质疑老师，只是重复已有的观点，争取在每一道题获得满分，而不去想为什么会有这道题、有没有更优解。”

这和杨宁印象里的文学课大相径庭。

在学生时期，“叛逆”的他不愿拘泥于课本知识，拿到试卷后，总是想着每道题还有没有自己的答案。“甚至在考试里，我还会写我认为对的内容，总是想把所有标准答案都‘批判’一下。”杨宁笑道，“这肯定让老师很头疼。”

没想到，成为老师后，让他头疼的反而成了学生们千篇一律的答案。

“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是一个经受过标准化训练的学生。”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每份作业都无比贴近“标准答案”，少了点“人味儿”。但这不是杨宁想要的结果，独角戏般的课堂、完美的答卷、唯分数论的功利性教育，最终指向的不过是机械的“人”。

“人文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提醒你，你是一个‘人’。”杨宁说，教师、学生、医生、警察……这些不过是划分的社会职业，而归根到底，作为一个“人”，要有对世界纯粹的、直觉性的判断。

杨宁常常从自己两岁的孩子身上获得启发。“小孩会很直接地评价哪些是美的、哪些是丑的。”而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感受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迟钝、麻木，最终沦为功利性的判断。比如看到一些自然景观，小孩只会觉得

很美，但成年人会考虑，看完之后要不要写个感想、发个朋友圈，再配点相关的诗词。

“除了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外，现在很多人不敢作出审美判断。”杨宁指出，资本、消费社会、他人评价……受到多重因素影响，大多数人难以完全忠于自我感受，而选择人云亦云。“这是个严肃的话题，能否独立作出选择并对其负责，本质上体现了一个人‘自我’的觉醒。”他说。

杨宁表示，这些正是审美教育的关键。

“审美教育就是一种反思性教育，逐渐构建独立认识世界的框架，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。”杨宁认为，这也是文科教育的目的——为世界赋予意义。

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质疑。

“大学校园就是一个象牙塔，应该包容不同的想法、声音，允许它们相互激荡、碰撞，擦出新的火花。”杨宁叹了口气，“但现在的学生都太‘乖’了。”

## 不能期待用一门课改变

杨宁理解，这份“乖”其实是“内卷”压力下的无奈之举。尤其这两年，甚嚣尘上的“文科无用论”，已经成为每个学生头上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
“‘文科无用论’不是今天才有，但为什么近些年被重新提起？”在杨宁看来，这是信息获取日益便捷、获取文科知识门槛较低的结果，“所以与其说文科无用，不如说它已经融入日常生活，不用通过系统性教育就能获取，这是件好事”。



然而，这对文科教育提出了全新命题：知识之外，还应当承担起哪些责任？

杨宁认为，这包括两方面。“首先，文科的通识性教育应该重视理论，而非简单的作品赏析。”不同于普遍印象中的晦涩难懂，实际上，文学理论能帮助人建立起认识、理解世界的框架。“我们能从哪些角度理解、分析文学作品，某一现象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文化因素，可以从哪些角度思考，都需要理论地学习。”

相反，在杨宁看来，驾驭文学作品远比驾驭理论困难得多。“就拿《红楼梦》举例，你能对作品本身做出多少独特的解读？其实大多数人都人云亦云，但我们能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小说情节、人物形象塑造。”

“通识教育绝不是体验教育，读读书、写写字、跳跳舞、弹弹琴来进行所谓的陶冶情操，这就从艺术教育变成了工艺技术，和艺术培训班有什么区别？”杨宁反复强调，恰恰相反，通识教育更加需要理论学习，“要帮助形成对世界、对社会、对自我的思考和认知框架”。

另外，对中文系学生来说，要在保持质疑、反思精神的基础上，再进一步探索。

“相当于不断地补充文末注释，对专业知识展开专业思考。”但杨宁反问，如果全凭个人喜好点评作品，而没有专业性的分析、和普通读者有什么区别？

这些同样需要理论教育的支撑。“现在的问题是，研究生不读书、本科生乱读书。”杨宁摇摇头，研究生更重视论文，不关注原典，而本科生还不具有完整体系，就去“啃”大部头理论，难免一知半解。

“因此，本科阶段的人文教育更侧重拓宽知识面、搭建完整知识体系架构，研究生阶段则要回归著作本身、深入钻研。”杨宁说。

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应该分别突出哪些重点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杨宁反问：“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课程来解决问题？”不会写论文就开一门论文指导课，不会谈恋爱就开一门“恋爱课”，那究竟谁有资格来授课，是论文写得多的、恋爱谈得多的吗？

“这些都只是形式，我们不能期待通过一门课来作出改变。”杨宁说，家庭、学校、社会，都应当是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而更重要的是，面对变动的社会环境，人文教育亟须向前一跃，回应现实挑战。“我们要以现实问题切入，来呈现文学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和现实意义。”

# 我在课题组的三年宫斗

■王博

三年前，考研复试结束不久，一位正高级职称的导师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表示“相中”了我，邀请我读他的研究生。

接到电话的我，被兴奋冲昏了头脑，几乎没有犹豫，当场答应。

那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，一旦选错导师，便意味着要独自面对一整套系统失灵的后果。等待我的，是一场持续近三年的课题组“宫斗”噩梦。

## 当导师成为“老板”

在很多课题组里，导师与学生的关系，本质上就是一种“老板 - 雇员”的关系。

提前进组时，表面氛围看起来还不错，但真正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：与导师的沟通始终有些怪异。导师当初承诺，提前进组“能学到很多东西”，但实际情况是，我们很少真正参与研究，更像是在为导师处理个人杂活儿。

有时，导师会要求我们花一两周时间调研某个方向，熬夜查文献、写方案，投入大量精力，最后却发现这往往只是导师一时“头脑发热”，项目很快不了了之。

与此同时，科研资源的紧张也迅速显现。前些年，组里有几个项目没能申请下来，经费捉襟见肘，几百万元的仪器也已经超期服役，故障频出且极不稳定。仪器有限，有些设备我几乎完全轮不上，只能站在一旁围观师兄、师姐操作，无法上手实验。

问题并不只是“穷”。我的导师五十多岁，已经过了科研的发力期。作为正高、PI（课题组长），没有人会真正 push（督促）他，他自己也并不着急。

在日常组会中，同学们轮流汇报进展，导师在点评环节照例鼓励大家“提起干劲、为人民服务”，却很少对研究设计或具体实验细节提出明确意见。论文修改也是如此，导师往往只关注如英语语法、词汇运用等语言层面的细节，真正从学术角度提出的修改建议并不多。

我观察身边同学的状态发现，好的课题组各有各的风格，但真正不好的课题组，是既要求学生拼命“卷”，又不给任何相应的支持。导师期待学生“卷”出成果，却并不真正投入具体的学术指导。

很不幸，我们组就是这样。

## 同门的隐形霸凌

读研以来，我在组里学到的实验技能，大多来自师兄、师姐。许多实验技巧和经验，只能靠“人传人”。一旦有人毕业，这些经验又没传下来，就会在组里直接“失传”。

但由于我在学院里参与公共事务，尤其是“露脸”的机会较多，无意中引起了一些师兄、师姐的敌意。

他们很少直接排挤我，而是采取更隐蔽的方式：所有人都教，唯独不教我；或在具体操作中明显区别对待。即便导师明确要求我学习某个实验技能，负责的师兄也会表现出一种“生怕我学会”的刻意防范。

更极端的是所谓“皈依者狂热”。一些追随者的表现，甚至比核心成员更激烈：见面不打招呼，话里话外阴阳怪气，课题组的私下活动刻意将人排除在外。

相比之下，抢作者的问题在我们课题组反而并不多见。这类行为过于敏感，更多发生在急需“帽子”的年轻教师身上。年纪较大的导师若将名字直接挂在一作位置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那就太难堪了。

当师生门关系出现矛盾时，导师本身也很难起到缓冲或调解的作用。

有一次深夜，导师发微信让我整理一份材料。我熬夜做完并第一时间发给他。第二天才发现，他其实把相关任务同时布置给了好几位学生，还对没能及时回复的同学说：“小王都能交，你为什么不能？”

久而久之，那位同学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。

## “宫斗”是一种结构性问题

回过头看，这些问题并非个人冲突，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困境。

在课题组里，导师几乎等同于“老板”。如果放在公司体系中，导师相当于同时掌握行政权、人事任免权、财政权。当所有关键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导师是什么样的人，课题组往往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。

更现实的是，在进入这家“公司”之前，学生几乎不可能真正了解其内部运作机制。而所谓的“工资”（学位），却要等到“离职”（毕业）前，才能一次性结算。

导师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目标错位，这也在不断放大矛盾。导师希望发“大文章”，积累学术声誉；学生更关心的则是能否按时毕业。这种高度不对等的风险分配，本身就让学生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。

在一些课题组，学生能否得到支持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帮导师写本子、发文章，甚至提供情绪价值。但论文成果并非年年都有，那么学生这一年“做得好不好”，往往只能由导师来定义。

以我们课题组为例，学期末评选奖学金，奖金从几千元到一万元不等。最终获奖的，是一位虽然没有发表高水平论文，但帮导师写本子写得最好的学生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导师难免偏心。即使向导师反映课题组霸凌的问题，得到的回应多半是“要和师兄、师姐处好关系”，或者干脆各打八十大板。导师很少真正承担调解责任。

从制度层面看，学校对导师权力的约束非常有限。研究方向高度依附于个人名下，外部介入管理的成本极高。很多时候，只有在出现极端风险，比如学生轻生时，系统才会被迫介入。

在一个不友善的课题组，学生能独善其身吗？我观察到的情况是，除非研究方向与导师、同门完全错开，选择单打独斗，否则几乎只能卷入其中；而单打独斗的代价，则是缺乏任何有效指导。

至于换课题组，又有多少研究生能承担延毕的风险，把本就有限的时间成本用在重新选择导师上？

## 给后辈的建议

正值考博季，我申请了另一位导师的博士项目。在正式决定前，我已经多方打听，确认其组内氛围相对健康。

对刚考研、考博但尚未选定导师的同学来说，我有几点并不新鲜却很重要的建议。

第一，尽可能多地获取真实信息。一定要抹开脸面，多走、多看、多问，尽量在课题组里实际待一待。

复试后的短暂面谈、在课题组兜一圈，几乎不可能看清一个课题组的真实氛围。甚至，同一个老师，在你是或不是他名下学生的情况下，态度都可能完全不同，因为这里牵涉的是直接而现实的利益关系。

看的课题组越多越好，不要因为“感觉还行”，就死死待在一个地方不动。

但说实话，这件事本身非常难做到。刚被录取时的喜悦，很容易让人头脑发热。刚进入新环境，导师在学生眼中天然带着权威光环，学生并不了解导师是什么样的人，也会觉得导师“很厉害”，不敢忤逆，更不好意思提出“再看看别的地方”。

在这些现实限制下，很多学生其实并没有真正选择导师的权利。更多时候，只是在网站上看看导师简介，觉得还不错，就报考了。

第二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导师类型。相对而言，导师主要分为两类。

一类是年轻导师，虽然会卷，但目标明确、愿意投入精力，能实实在在带学生出成果，文章一般也发得比较快；另一类是年纪稍大的导师，组内不卷，人相对温和，要求稳定，但成果产出较慢。这两类都是口碑较好的导师的两种标准模板。

尤其是刚起步的年轻导师，往往最有冲劲，也希望培养好自己的“开山弟子”。学生与年轻导师的年龄也更相近，许多问题容易顺畅沟通，不需要在复杂的师生门关系中周旋。当然，组内可能会稍微卷一点，但这是相对可预期、更公平的卷。

第三，必要时尽早止损。

读研进入课题组，其实是年轻人迈入社会环境的第一步。

从本科到研究生，很多人习惯压抑情绪，不敢提出换导师、不敢争取课题组轮转，总觉得“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”“再忍一忍就好了”。但如果已经确认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，拖得越久，付出的成本只会越高。

毕竟，很多时候你面对的，并不是一场个人失意，而是一种结构性困局。

（王博系化名，本报记者孟凌霄采访整理）